

浅析汉语地名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龙洁虹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长治 046011)

[摘要]地名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是词汇的组成部分,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地名的由来、变化和发展反映了汉民族文化特征。我们试图从地名与宗族文化、祈福文化、地理文化、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着手,探究汉语地名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汉语;地名;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7)04-0087-03

地名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语言记号,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地名通常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所以能比较完整地保留命名之初它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地名的形成大都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它反映了人们的宗族观念和祈福心理,记载了地理变迁与民族融合,体现了社会政治观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一、地名蕴含的宗族文化

中国古代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宗族是社会构成的基础,同一宗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拥有相同的姓氏。上古时期,姓和氏是有区别的,姓代表氏族的血统,氏是代表宗族系统的称号。从战国时期起姓氏开始通用,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写到,氏的来源有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等。而“国”“邑”“乡”“亭”都与“地”有密切的关系。如屈原是楚国贵族,“半”姓“屈”氏,“半”是楚国的国姓,“屈”是屈原祖先作为皇族的一支被封到“屈”地后,为区别于楚国王族的“熊”氏,而以封地名称“屈”作为氏的。由此可见,姓氏与地望紧密相连。

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国家,老百姓安土重迁,流动性小,同族或同姓的人聚集居住在一起,他们把

居住地当做自己的领地,形成独立的村落,村落的名称往往就以聚居地宗族大姓的姓氏来命名。在我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随处可见如王村、李庄、张店等以姓氏来命名的地名。高阁元先生曾对县地名做过抽样调查,结论是:“汉语姓氏地名,在不同的地区占有不同的比例,最高的80%,最低的也有15%,一般约在30%~50%之间。”^[1]这种以姓氏冠名、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命名方式蕴含着中国人强烈的宗族观念。

二、地名蕴含的祈福文化

历史上中国人饱受战乱之苦,因此祈求天下太平,希望福寿安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人们把地名作为美好愿望的载体,常以蕴含太平、吉祥、幸福、永乐等内涵的字来给地址命名,希望借助语言的灵性实现心中的夙愿。就全国范围来看,包含“福、泰、安、康、昌、盛、泽、清、宁”等字的市名、县名、乡镇名、村名特别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册》中收录的地名统计,以“太平”命名的地方有54处,以“永安”命名的地方有29处,以“永宁”命名的地方有26处,以“昌盛”命名的地方有25处。^[2]《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收录含有“福”字的地名有60多处。再如陕西榆林的定

[收稿日期]2017-04-28

[作者简介]龙洁虹(1979-),女,山西太原人,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边、靖边两县县名具有寓意安定边防之意。明代正统年间朝廷为抵御鞑靼的入侵,在白于山与毛乌素沙漠的走廊地带设置了定边营城、安边营城和靖边营城,三边从此成为固定的区域地理名词,定边、靖边随后延用了下来。又如长治、大同、承德、保定、清远、抚顺、顺德、平顺等地名均包含了安定太平、风清气正的美好祝愿。香格里拉是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呼和浩特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巴彦淖尔源自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湖泊;齐齐哈尔是达斡尔语,有“边疆”或“天然牧场”之意。另外人们也常以祥瑞的动物给地址命名,如以传说中的神鸟凤凰象征太平、和美,因此带“凤”的地名也不少,如凤阳、凤县等。这些地名都带有美好的寓意,寄托着人们祈福、求福的文化心态。

三、地名蕴含的地理文化

地名也保存了地理变迁的痕迹。有些地方的命名是依据当时的地形地貌特征而来的,具有鲜明的地理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地理环境不断变化,当时的地形地貌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改变,命名之初的特征荡然无存,但我们通过延续下来的地名,依然可还原出该地当年的地理概况。上海地处江南水网地区,水体面积占到全市总面积的12%左右。境内河流纵横交错,自北而南分属长江水系、吴淞江水系、黄浦江水系及杭州湾水系。从战国时起,上海地区开始出现“三江”等水域地名的记述;秦汉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松江、昆山、柘湖、沪淞、谷水等自然地名的记载,但遗存不多;唐至五代时期,上海地区大部分变成陆地,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地名随之增多;元明时期,上海地区水系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黄浦江水系逐渐代替吴淞江水系成为上海地区最大的水系,崇明岛形成后自然地名进一步增多。近代地理学形成以后,各种地形区、水文区、地貌区等自然地理分区名称逐步出现。而有些地理实体在经济开发中被湮没了,但其名称却保留了下来,如上海市区内的肇嘉浜、虬江、方滨等河流因填筑筑路消失了,但其名称却被改为路名并沿用了下来。

四、地名蕴含的民族融合文化

地名记录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因各种原因,多次出现民族大迁徙与民族大融合的现象,从现在延续下来的地名中就能看出各民族文化交流与接触的印记。1644

年满族入关,随后建立了清王朝,大批满族人纷纷定居北京,他们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语言文化带进了北京,至今北京城里许多街巷的名称依然保留了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迹。如“沙拉胡同”中的“沙拉(沙刺)”是满族语“珊瑚”的意思,“噶哩胡同”是清代两江总督噶礼曾住过的地方,“索家坟”因清初四大辅丞之一的索额图的家坟在此而得名。而“胡同”一词更是来源于蒙古语 *gudum*,是“水井”的意思,它是元朝人对北方“街巷”的通称。另外像案板章(昂帮章京)胡同、牛录坟等都是满族语中与官职有关的地名。

满族人入关的同时,大批汉人为了躲避战乱陆续迁往东北,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主体,东北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原先的地名却被人们沿用了下来,诸如巴彦、呼兰、木兰、吉林、富拉、佳木斯、伊通、延吉等都是少数民族语地名。当然,也有一些地名是受到了汉语译音的附会而形成的汉化地名,如摩天岭、蚂蚁河、夹皮沟、老爷府等原本是源自满族语的,却明显带有了汉语的特征。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他们在交往中彼此融合,形成了民族大团结的和谐景象。

五、地名蕴含的政治文化

社会政治观念的变化也能影响到地方的命名。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经常将许多带有教化意味的词语用于一些特殊地名上。如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市在清代乾隆年间已被称为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源自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后为平定准噶尔部扩建城池,竣工时将扩建后的新城易名为“迪化”,有“开导归化”之意。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民族平等和团结、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政策,1954年迪化市恢复使用原名乌鲁木齐。再如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明朝时赐名为“归化城”,“归化”即“归顺朝庭、接受教化”之意,民国时称“归绥”,1954年又被更名为蒙语的音译名呼和浩特。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正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好时期。很多地名,尤其是街道名都体现出昂扬向上的风貌,如人民路、建设路、解放路、八一路、英雄街等。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适应红色革命的需要,很多城市的街名又都换成了新地名。“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许多地名又恢复了旧称。(下转131页)

- [2015]28号.
- [4]杜文东. 心理学基础[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122.
- [5]乔建中. 教育心理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244.
- [6]王临. 中国目前大学教学中的创新教育探索[J]. 教育与职业,2013,(23).

[责任编辑:郭昱]

=====

(上接88页)

地名是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自然地理实体所起的名称,记载着一个地方的自然历史变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汉语地名是一座丰富的宝藏,是文化的“活化石”,通过对地名的研究与考察,我们能更深刻地

了解我国民族文化中的深厚内蕴。

[参考文献]

- [1]高阁元. 姓氏与地名[J]. 地名知识,1986,(2).
- [2]张晓涛. 地名中的文化现象浅议[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4,(5):121-123.

[责任编辑:邦昱]